

日中关系 30 年

国分良成

200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日本也把 2002 年定为“中国年”各方面开展了很多庆祝活动。日中双方相当规模的访问团进行了互访。

然而，关于这次日中交流活动，日本的报纸、电视却很少报道，其原因可能是新闻媒体认为普通民众对此不感兴趣。相反，关于沈阳总领事馆事件、不明船只问题、靖国神社等对日中关系有负面影响的报道却很引人注目。同时，对中国或对日本对华态度的攻击性报道题目也比较多。很遗憾，这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的现实。

与日中邦交正常化 10 周年、2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不同，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没有成为解决日中摩擦的有效手段。也没有在解决日中摩擦上创造出任何新的途径。小泉首相能否正式访华到现在还没有得出结论。30 周年作为一个时代的总结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已经到了从这种邦交多少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毕业的时候，日中关系也应该进入专心构想如何构筑日常的两国关系的时代。也就是说，日中关系已经从量的时代进入了质的时代，需要构筑更为成熟的两国关系。

1972 年以来的 30 年，日中关系被视为一衣带水、睦邻友好。发展两国关系虽然存在着很多障碍，但是日中两国也有不重蹈战争覆辙的默契，因而过分地追求友好关系，无条件地为日中友好干杯。但是，现在这种感情型的日中关系已经过去了。

30 年来，日本一直重复着由对华乐观论转为对华悲观论这种循环。这种循环说明感情型的日中关系存在着很大的脆弱性。

从 1972 年到现在，日本经历了四次中国热。

第一次是 1972 年前后的恢复邦交热。但在 1974 年田中首相辞职后，日中邦交热随之逐渐消失。

第二次是 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的热潮。在缔约前，日中两国还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日本进口中国的石油，中国进口日本的成套机械设备。当时中国确定了经济现代化的路线，日本企业准备一举打入中国市场。但是，1980 年底 1981 年初，中国停止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于是日本对华认识很快转为悲观。

第三次是 1984 年。中国决定开放沿海城市以后，日本的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但是，1985 年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日本的中国热也随之消失。

第四次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日本企业借着日元汇率升值的优势，大举进入中国。但是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因为中国投资环境、亚洲金融危机、台湾海峡危机等问题，日本企业开始从中国撤出，对华悲观论也随之盛行。

最近出现了对华投资的第五次热潮。但是这次中国热与以往的四次不同，这次的中国热并不一定因为中国市场吸引了日本企业，而是因为日本经济不景气致使日本企业把眼光转向中

国。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日本企业进军中国。但是，我却认为是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导致了第五次中国热。

与欧美对中国的投资不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从 2000 年开始急剧增长，投资增长最多的产业是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这说明，日本经济结构致使日本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为寻求廉价的劳动力，到中国去寻找机会。

日本的这种对华投资 在中国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促进技术转让上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对华投资也造成了日本产业空洞化，从而引发了日本对中国农产品的进口限制措施和中国的关税报复措施。这些问题都与日本经济的严重不景气有关。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现在的日中关系呢？我觉得日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日双方的互厌情绪，也就是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印象恶化的问题。漫画、汽车、生活用品等日本生活文化在中国盛行，但同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反日言论也很多。就是说，日本的产品和文化虽然遍布中国，但是中国人的日本观却一直没有好转，有时甚至出现强烈的反日情绪。日本人的中国观也没有好转。根据日本政府的舆论调查，自 1989 年以来，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和没有亲近感的人数一直持平。2001 年的调查结果是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占 47.8% 没有亲近感的占 48.1%。这个数字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 1980 年有 78.6% 的人对中国有亲近感，但当时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只有 7 万人 来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到 2 万人。而现在去中国的日本人有 150 万，来日本的中国人超过 40 万。也就是说，中日双方相互依存的扩大，造成了两国对对方认识的复杂化。

现在有许多中国的研究者活跃在日本 在大学和很多专业职位上中国人的存在感逐步扩大。这都是产生积极效应的方

面。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日本犯罪人数每年增加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了负面影响。相互依存的扩大，也会使两国的摩擦增加。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结构性问题，即日中关系因为没有摆脱 1972 年体制，才造成了现在不稳定的局面。

之所以要摆脱 1972 年体制，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为了对抗苏联，但 1989 年冷战的结束影响到了日中关系的基础。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冷战时，日美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对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有利。冷战结束后，对于逐步强大的中国，日本开始迷茫。日本人需要树立新的中国观。

第三个原因是世代的交替。日中邦交正常化既是美中和解的产物，也与日本国内强大的要求恢复邦交的呼声有关。但是，现在 70 岁以上的一代人已经退出一线，年轻的一代对中日关系没有以往的那种特殊感情，愿为构筑两国关系而竭诚献身的人也不多，日中交流的渠道也很有限。

第四个原因是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在日本积极促进日中关系的是田中角荣派和后来的竹下登派、野中广务等桥本派。现在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政治凝聚力逐渐减弱。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做出最终决断，防止了日中关系的恶化。到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由上至下统一意志的相对弱化、爱国主义教育等都影响到了日中关系。

第五个原因是台湾问题。1972 年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热烈欢迎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但是现在日本人对台湾的亲近感逐渐增大，台湾人的亲日感情也随处可见。这不仅因为李登辉是亲日派，也因为台湾实现了“民主化”使日本和台湾之间可以自由进行文化交流，致使日台交流扩大。对于日台的这种相互亲近，中国只是单纯地把它当成威胁来看。在台湾问题上，日中关

系很是微妙。

在日本，带有自虐倾向的丧失信心论和缺乏世界观点的惟我独尊论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情绪。媒体又在宣传中国大国论和日本空洞化论。所有这些，都刺激着日本人天真的心理状态，制造出厌华气氛。

中国的日本观也有不正常的一面。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以前的日本军国主义上。虽然中国人也称赞日本经济成长，但是对日本民主主义的成果却缺乏认识，对半个世纪以上日本都没有发动过军事行动缺乏理解。一提到历史问题就马上联想到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这种不符合事实的逻辑，必定不会被日本人接受。

日中双方都缺乏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包括对对方的认识，也包括自我认识。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要向大国方向发展，增大政治发言权以遏制中国。而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将成为经济和政治大国并遏制日本。这两种想法都很感情化，缺乏冷静的分析。中日两国现在没有余力互相嫉妒。日本的再生对中国有利，中国的健康发展也对日本有利。日中两国现在缺乏对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真诚的认识和行动。

我的结论是：现在日中关系需要从感情型友好关系，向以相互利益为前提的实务性关系转换，这是超越 1972 年体制的构想和创造。

增进中日相互理解 和信任的途径

崔世广

2002 年时值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是值得纪念的年份。经过 30 年的发展，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不可否认，在两国关系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两国民众间缺乏理解和信任，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不断降低的状况令人担忧。例如，这一年两国虽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但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高潮，这真实地反映了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的现实。

本文拟在回顾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相互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对影响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信任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几点看法。

一、中日相互认识的三个阶段

总的来看 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年来 受国际环境 各自国内状况及两国关系等诸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大体经

历了三个阶段，即大体每 10 年左右为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72 年到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1972 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长期对立的状态，在两国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从此友好和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由于中日关系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中国终止了战后以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中国媒体中批判日本的言论大大减少，两国间友好交流不断增加。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还处于不正常时期，中日两国虽然恢复了邦交，但在各个方面仍处于不能自由交流的闭塞状态，普通的中国国民还无法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况。因此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部分民众的对日认识仍处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影响之下，对中日关系不太关心或感到迷惑。

战后初期受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内阁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影响，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是比较低的。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支持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识明显好转。特别是在 1972 年 8 月田中首相做出访华决断后，日本国民中喜欢中国的人与讨厌中国的人发生逆转，前者超过后者。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中国热”，喜欢中国的日本国民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普通国民与中国的实际交流并不多，因此对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反省成为支持“中国热”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阶段为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1978 年，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为中日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 80 年代后，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阶段，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获得了空前的进展，两国国民的相互认识和感情达到历史最好状态。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

放 中日之间经济、文化等交流逐步扩大 中国人接触、了解日本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有关日本的各种信息、介绍以及研究，对加深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 80 年代 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除了历史认识等外，大部分是肯定的和友好的。可以说，富裕的、现代化的日本形象，给中国普通百姓以强烈影响，在中国甚至出现了“向日本学习”的口号。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否定转向肯定。此期间虽然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光华寮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日本认识的基调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 在 80 年代，许多日本人不仅对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抱有一种负罪感，而且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抱有感恩心理，希望通过推动日中友好来报答中国。另外，中国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日本人也还能保持一种帮助弱者的心理宽裕。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政策，民间也大力配合，在资金、技术、接受留学生等方面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在出现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光华寮、宝钢事件等问题时，日本领导人也能与中国领导人一起，从日中友好的大局出发，做出政治决断。据日本总理府的舆论调查，80 年代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率大体保持在 70% 以上，喜欢中国的人远远超过讨厌中国的人。另外，还有舆论调查表明，不少日本人视中国为可以信赖的国家。这些都显示了日本国民对华感情和认识的良好倾向。^①

第三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后到现在。这一时期，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终结，新的国际新秩序处于形成过程中，中日两国都制定了新的国家发展目标。这样，在“以政治大国为目标的日本”和“以经济大国为目标的中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加深的同时，缺乏相互信赖关系的竞争和摩擦的可能性也表面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强化军事同盟、钓鱼岛问题，尤其是近年来的教科书问题和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使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明显变化。1997年和 2002 年，朝日新闻社分别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联合舆论调查，结果表明，90 年代以来，中国人的对日感情急剧恶化。在 2002 年 9 月的调查中，讨厌日本的中国人超过半数。^②

同样，进入 90 年代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也日益严峻起来。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由于受到 1989 年政治风波的影响一度降温，但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日经贸关系扩大，再加上天皇访华，使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有所改善。但在国际形势变化和经济长期萧条的作用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日渐抬头，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视中国为威胁的“中国威胁论”流行开来。再加上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中国核试验问题等的影响，日本人中国观中的负面因素增加，对中国的亲近感不断下降。据日本政府 2001 年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为 47.5%，“没有亲近感”的为 48.1%。^③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日两国国民感情从疏远到接近，又从接近到疏远。进入 21 世纪，中日关系和两国国民感情正面临新的考验。

二、造成中日相互印象恶化的诸因素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印象恶化的情形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环境的变化。1989 年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中日关系和两国国民的相互认识带来深刻

影响。“1972年日中是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背景下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美实现和解是为了对抗苏联，日中邦交正常化实际上也具有日美中联合对抗苏联的意义。然而，苏联的消失使日美中失去了共同的战略目标，“日美中合作构图自行消失”。^④国际环境的变化，必然对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产生影响。

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渐确立了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强化了对世界的单极支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虽然有不少人讨厌美国、感到了美国的军事威胁，但同时也存在着重视美国，想与美国搞好关系的舆论倾向。^⑤中日舆论重视美国的结果，必然会带来对对方的相对轻视。

第二，社会的变化。在70、80年代，主导中日关系发展的是中日老一代政治家，尽管中日两国间出现了许多问题，但都是领导人最后做出决断，避免了中日关系恶化。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们能主导或左右国内舆论。但是，“在日中两国社会多元化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政治’越来越不能对这些想法产生影响”，^⑥。随着具有不同利益、立场、观念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日关系的进程中来，两国的政治领导人越来越难以把握公众的感情和认识，相反，领导人在决定政策时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国民的各种意见。

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和国民情绪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利用公众的信赖和对信息的垄断，或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灌输给读者和观众，或出于商业目的对中日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大肆渲染，或发表一些有损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言论诱导舆论，对中日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和感情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可以说，当前中日国民感情的恶化，与中日的一些媒体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有不小

关系。

第三，两国战略发展目标的影响。冷战的终结使原有的世界格局被打破，世界进入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不平衡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大国，都对自己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相应调整，以实现自己在新时期的战略利益。这不仅使中日关系从“友好压倒一切”的时代进入了重视国家利益的时代，两国关系中摩擦和竞争的一面上升，甚至还会引起对对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安与猜疑。例如，日美加强军事同盟关系、日本通过“周边事态”相关法案以及向海外派兵等动向，引起了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的疑虑。同样，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加强国防力量，也引起了一部分日本人的猜忌。

而且，中日两国地位的相对变化，也使国民心态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80 年代，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日本人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在日本也听不到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但当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 10 年”使日本人失去自信，不少人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充满了危机感，开始把中国看成自己潜在的甚至现实的竞争对手，“中国威胁论”开始流行起来。相反，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使中国人逐渐自信起来，一些人摆脱 70、80 年代的对日自卑感开始以对等意识或优越意识来看待日本，中国可以说“不”的论调及一些新闻媒体的对日强硬论就是其表现。心理的不平衡也是影响中日两国国民客观认识和理解对方的一个障碍。

第四，中日关系中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影响中日国民感情和相互理解最大的要素，归根结底还在于中日关系自身。毋庸讳言，中日关系虽然 30 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中日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欠缺，这就是政治、安全关系与济、文化关系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根源于两国缺少真正

的信任关系，又是造成新的不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日之间虽然有《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等三个重要文件并在 80 年代确立了发展中日关系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互相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但就是在两国关系良好的 80 年代，也很难说两国建立了真正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因为就是在 80 年代，连续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光华寮问题、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另外，在中日两国间也一直存在安保和军事交流的障碍。虽然有些问题一旦表面化，都会由当时中日双方领导人的决断获得了结，但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时在中日关系中投下阴影，成为一直困扰中日国民感情的问题。90 年代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各种舆论调查显示，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安保问题，是从根本上影响中日两国国民感情和建立相互信赖关系的主要因素。^⑦

三、中日两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基础

如前所述 中日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 两国国民感情在恶化，这是事实。但是，中日之间并非完全失去了支撑友好关系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两国国民的感情并非决定性地恶化了。例如，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日本对华抱有亲近感的仍占半数左右，中国人中讨厌日本的人虽然增加了，但在 2002 年仍有 10% 的人明言喜欢日本 这与 1997 年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⑧这主要因为在中日关系存在着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若干基础。

首先 经贸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始终在增进国民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0 年来 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的对外投资对象国之一。在经贸领域两国之间虽然出现过一些问题和摩擦，但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经济交流对中日关系和两国国民加深相互了解的贡献是巨大的。经济的交流同时也是一种人的交流，人们在从事经济、商业活动的同时，也在加深对对方的理解。随着中日经济交流的深化和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两个国家的商品都已进入了对方国家的普通百姓家，这在促进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成为接触和了解对方国家的窗口，如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好感，不少来自对家用电器等产品的信赖和喜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资金、技术、人员等各方面获得了日本的大力支援，得到了巨大实惠，这对培养中国人民的对日友好感情是有益的。

总之，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日本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和“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但事实证明，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是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和中日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重要保证。

其次，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日益加深，对增进双方的理解和友好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9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从80年代起，两国政府设立了定期文化协商会议，同时，开始了高级文化教育官员的互访。1981年起，日本政府每年向我国提供文化无偿援助，以充实和改善我国的文化设施，援助我国的文化遗迹保护事业，并在贫困地区援助建立希望小学。

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迅速扩大。中日双方

的许多大学都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在不同领域进行着活跃的学术交流。互派留学生的工作也进展得很顺利。除了使用两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自费留学生。据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有关统计，1999年，在中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为12784人，占外国留学生总数的29%，是在各国留学生中为数最多的；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25907人，占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7%，同样也是最多的。不少舆论调查的结果表明，有在日留学经验的中国人比没有这种经验的中国人的对日好感度高，在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中，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

随着中日两国交流的深化，日本的动画片、唱片、化妆品、时装、料理等开始在中国大城市流行，富有美意识、感性和现代特点的日本文化正在冲击和影响中国的青少年一代，这无疑会改变今后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理解。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不管怎样，文化和人员交流对两国社会发展和相互理解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视。

再次，中日两国决策者对发展中日关系信念坚定。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中日关系出现过一些问题和曲折，两国国民感情产生过一些冲突，但中日关系之所以比较顺畅地发展下来，两国国民感情没有严重对立和彻底恶化，主要得益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坚定信念。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中日关系，日本的多位首相也指出“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可以认为，这种信念和认识得到了大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中日两国作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仅对自身，就是对亚太地区的安定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已被历史发展所证明。中日关系之

所以经历了诸多波折仍获得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日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应当成为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宝贵经验。当然，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信念，是主动、真诚认识和了解对方的重要前提。

四、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途径

那么，应如何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呢？我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

——进一步扩大经济交流。回顾 30 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经济交流一直在增进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舆论调查表明，认为中日之间以后应特别在经济交流领域加深关系的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占首位（分别为 59% 和 51%）。^⑤ 现在，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两大趋势。2002 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 10 年内实现自由贸易的协定，日本也提出了与东盟 10 年内实现自由贸易的构想。但是，在中日这两个大国之间，却未能就自由贸易谈判达成一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以后，中日两国应积极顺应世界潮流和两国国民的期待，以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为目标而努力。可以相信，随着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两国国民的理解和信任也将深化。

——加强文化和人员交流。现在中日文化和人员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如近年来每年人员交流达到 200 万人之众，但对对方文化缺乏理解的现象仍很突出。其原因之一是人员交流的力度还不够，特别是中国方面需要不断努力；其二是虽然日本现代文化大举涌入中国，但中国人关注更多的是日本的家用电器，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认知还不够；其三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影响的

主要是历史、传统艺术、中医中药等，而现代文化对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如何通过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形成尊重不同文化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有魅力的新文化，是摆在中日双方面前的课题。

——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是最敏感、最难以处理的问题。因为这里面不仅有国家利益和目标的冲突，也掺杂了太多的民族感情。邦交正常化 30 年来，中日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倾注和耗费了很多的能量，但不仅没有获得最终解决，还加深了国民的不信任。这些问题，直接关系中日关系的基础，如何处理矛盾分歧，将是摆在两国之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课题。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国民的感情是不可缺少的，也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促进安全合作和军事交流。安全合作和军事交流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只有实现了安全合作，才能真正加强两国关系的基础，增强国民的相互信赖，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⑩如果中日乃至东亚能形成由经济到政治乃至安全的共同体，中日之间就会具备不可动摇的相互信赖的基础。

一换位思考，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对方。对中日相互认识和理解而言，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承认双方在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只有认识到这种差异，并能站在对方立场上看问题，才可以说达到了对对方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又是形成信赖关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当然，在交流中发现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发现双方的不同并给以某种理解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中日双方来说，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对方的优越感，在认识对方的同时反观自己，也是增进相互理解

和信赖的一个必要途径。

注释：

黄大慧：“日本的公众舆论与中日关系”，《21 世纪的日本——政治外交发展趋势》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61 页。

② 《朝日新闻》1997 年 9 月 22 日、2002 年 9 月 11 日。

日本内阁府大臣官房政府广报室编：《世论调查·外交》财务省印刷局 2002 年版。

国分良成：“日中两国应建立超越‘1972 年体制’的新关系”，《外交论坛》2002 年 10 月号。

参见《朝日新闻》2002 年 9 月 11 日所刊载的有关调查结果。

⑥ 田中明彦：“回顾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日本学刊》2002 年第 4 期。

⑦ 除了前述朝日新闻社与中国有关机构的两项联合舆论调查外，请参阅中国青年报社、读卖新闻社等的舆论调查。

⑧⑨ 《朝日新闻》2002 年 9 月 11 日。

⑩ 关于中日安全合作，参见姚文礼：“共筑东亚安全大厦——浅析 21 世纪之初的中日安全合作”，《日本学刊》2002 年第 5 期。